

董 谦（江 横） 著



戰時烽煙

山西人民出版社

戰時烽煙

董謙

(江橫)

著

晋新登字 6 号

战 时 烽 烟

童 谦 (江 横)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 字数: 280千字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册

*

ISBN 7-203-02036-3

D·304 定价: 11.90元

序一

永远铭记这壮烈的一页

序一

在抗日烽火燃遍祖国大地的日子里，敌后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自己的机智勇敢和流血牺牲，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从1942年到1945年，晋冀鲁豫边区太岳抗日根据地沁源县八万军民坚持二年半之久的对敌围困斗争，就是其中极为壮烈的一页，值得我们和子孙后代永远铭记不忘。

围困沁源敌人的斗争，当时就受到党中央的鼓励和表扬。1943年，中共中央军委叶剑英等同志接见了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中共沁源县委书记、围困沁源指挥部政委刘开基等同志，赞扬了沁源军民的斗争。延安《解放

注：本序言，原为《没有人民的世界》一书而作。现把它作为本书的序一，重新发表。

日报》为此把江横（董谦）同志在沁源围困斗争前线采写的十来个通讯和报告文学集中起来，连续发表；并特地发表了《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把这个斗争誉为“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放出万丈光芒的异彩”！这是沁源军民的光荣，也是太岳军民的光荣，更是我党我军的光荣。

可是事隔30年之后，太岳军民这段光荣斗争史，竟被林彪、“四人帮”一笔抹掉了。我们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那时参加沁源围困斗争的主力军——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以下简称决死队），它于1937年8月1日建军后，立即开赴晋东北五台地区“打游击”，旋即奉朱德总司令命令，转赴晋东南扫除托派张慕陶的武装力量（当时阎锡山委派张慕陶为“山西省上党地区游击司令兼行政主任”），开辟抗日根据地。那时，决死队就由八路军总部朱彭总副司令指挥，成长为我党在山西建立的一支抗日劲旅；而在1940年6月成立太岳军区后，即在晋冀鲁豫大军区刘、邓直接指挥下，划归八路军一二九师建制。对于这段客观的历史事实，在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干扰和破坏下，完全被搞得面目全非，敌我颠倒。他们心怀鬼胎，随心所欲，把完全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以下简称牺盟会），和同样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决死队，统统诬陷为是由“一批大叛徒”“投靠阎锡山”组织起来的“反动团体”和“叛军”；而对一些赤胆忠诚、久经考验、同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一起坚持斗争的各级党政军民领导人，则被肆意诬蔑为“大叛徒”、“阎锡山特务”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残酷打击，横加迫害。原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当年坚持沁源围困斗争的三十八团（原决死队）团长蔡爱卿同志，就是横遭折磨致死的。约在1978年夏季的一个晚上，蔡爱卿同志的爱人带领

着5个孩子，突然找到西直门“第二招待所”，对我啼哭着说：蔡爱卿已病在垂危，念念不忘地希望能见老首长一面。哪知当我找到汽车，协同周仲英同志赶到医院时，这位参加过红军长征的老干部、坚持沁源围困斗争的猛将，已经含恨与世长辞了。此情此景，真叫人悲痛欲绝！原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参加过围困斗争的中共沁源县委书记侯振亚同志，则被强迫劳改致死。原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当年太岳区农救会主席、常年同沁源农民战斗在一起的农民的儿子卫恒同志，也是在法西斯野蛮酷刑的摧残下，抱恨含冤而死。还有其他许多老指战员，在不同程度上，也受到类似的遭遇。叫人气愤的是，这些冒着枪林弹雨南征北战的无产阶级战士，没有死于战火纷飞的战场，却死于林彪、“四人帮”的毒手。这就不禁使人联想起阎锡山在1939年为配合蒋介石第一次反共高潮而发动的“山西十二月事变”的情景，那时阎锡山就是把牺盟会和一切抗日群众团体污蔑为“反动团体”，把决死队这支人民的武装诬陷为“叛军”，把它们领导骨干都诬陷为“叛徒”，并分兵几路，大举进犯我根据地，对我军必欲除之而后快。历史有如此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对于标榜“最最革命”的林彪、“四人帮”，是一件多么富有讽刺意味的事呀！

坚持沁源围困斗争，能够被誉为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我们党依靠了这样一支由许多久经锻炼、英勇善战的骨干组成的人民武装（包括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以及具有高度民族觉悟的坚贞不屈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积极参加和支援，才迫使强大的敌人陷于汪洋大海，创造出这个罕见的奇迹——“没有人民的世界”，亦即类似通常所说的“无人区”。

围困沁源这段历史，是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创造的。据我回忆，当时中共太岳区党委和军区党委，就是根据中共北方

局、八路军总部提出的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的指示，具体确定了长期围困沁源敌人的方针。并得到当时在前方的领导人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积极支持。彭德怀同志在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出生入死，屡建战功，举世钦敬，对于他的惨死，更觉令人悲痛！在此谨向他表示衷心的敬意和悼念！还有已故的原国防部副部长、当年太岳军区司令员、多次身临前线亲自指挥沁源围困斗争的陈赓同志，以及在各条战线为坚持沁源围困斗争而献出自己生命的人民英雄们，也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怀念！

忆往昔，深知革命创业胜利来之不易；看今朝，倍觉未来祖国建设重担在肩。共绘宏图，实现现代化，还必须经历一段相当长的艰难险阻、坎坷不平的路程。让我们在党中央领导下，以周恩来同志为光辉榜样，拿出战争年代那股拼命精神，为建设现代化的壮丽事业献出我们的全部力量！

1979年3月8日

序二

辛勤笔耕 实事求是

張友漁

《战时烽烟》一书，收集了董谦（江横）同志在抗日民族战争、反磨擦斗争和解放战争中所写的部分通讯、报告文学、访问记、诗歌。这些作品曾发表在汉口《新华日报》、华北《新华日报》、《太岳日报》、延安《解放日报》、太岳《新华日报》等党报，以及西安《大团结》、《华北文艺》、《太岳文化》、《工农兵》等报刊上。当时，曾产生过比较大的社会影响，现在看来，仍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例如，沁源围困战的通讯报道是董谦同志战地报道中一次著名的系列报道。他当时作为新华社太岳分社副社长深入前线，随八路军、游击队、民兵，转战山头，攻打碉堡，在战地写出了通

讯和报告文学15篇之多。延安《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了这些前线通讯报道，并配发了《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1939年春，他对扼守在白晋北线的西北军一六九师与八路军团结抗战，以及武士敏将军壮烈牺牲的连续报道，不仅反映了从白晋战役到岳南战役的战争历程，而且记录下了抗战初期西北军武士敏将军率部与八路军并肩战斗、团结抗战的一段可贵史料。

1939年夏秋之间，在粉碎敌人对晋东南第二次九路围攻中，董谦同志又作为一二九师三八六旅的随军记者，连续报道了陈赓旅掩护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的云簇阻击战，和两次远征祁太敌占区的袭扰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华北敌后抗战开始转入最艰苦的敌我相持阶段。

这些作品，反映了董谦同志深入实际，和军民战斗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的作风。只有亲临前线，才能有这样真实生动的报道。他深入实际，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我是深有体会和深刻了解的。五十年代后半期，我到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任副主任，董谦同志是学部学术办公室主任，我和他接触的较多。1959年他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时，率领几十人的工作组，去河北昌黎县挂职作农村调查。当时农村正在大办公共食堂，并把公共食堂看作为农村共产主义的一块阵地。但他不唯上，不唯书，敢于实事求是，写出了《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的调查报告，勇敢地提出大办农村公共食堂并不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也并非群众完全自愿，“只能在群众完全自愿的情况下，办小型食堂或农忙食堂。”的意见。为此，他还受到严厉的批判和处分，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1年夏初，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讨论修改《农村六十条》的会议上，即迅速为他首先平反。可是“文革”时期，又说他是“刘少奇在全国刮翻案风的黑典型”，遭到批判斗争，被关进了“牛棚”。从他上述的经历中，无论是在采访工作中，还是在调查

研究中，他这种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在风浪中正确对待党的态度，都是一个党的新闻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应有的品德和修养。同时，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现在，董谦同志的《战时烽烟》诗文集就要出版了。正因为他如实地反映了一个时代一个地区一个事件的真实情况和第一手材料，所以，不论作为一个曾经有过重要贡献的老记者的辛勤采访记录，还是作为近代史、新闻史的研究史料，我认为都是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特别是对年轻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也是可以作为一本有价值的读物。故愿为之序。

1991年2月5日

在战时新闻工作中我走过的道路

《战时烽烟》诗文集，就要出版了。今年正值八路军开赴华北敌后抗战的55周年，我除表示热烈庆祝之外，仅以这本诗文集——一朵小红花，作为对这个节日的奉献和纪念！

光阴似箭，转瞬之间，我所经历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已过去半个多世纪或者近半个世纪了。那时我只是一个二三十岁的青年，而今已是年逾古稀的老朽了。在此诗文集出版之际，回顾一下战时10年的记者生涯，写一点个人的体会，也算是对自己这个时期的工作作个小结吧。

我是怎样走上新闻工作道路的，有它的历史偶然性，也有它的历史必然性。

所谓历史必然性，就是在走上新闻工作道路之前，在我身上已经滋长着内在和外在的条件。内在的条件，就是在高小毕业后读私塾时，我父亲把他在天津读过的《大公报》经常寄给我，并要我学习写小故事，寄给《大公报》《小公园》副刊。这个副刊也选登了我

写的两篇小故事。由此我对报纸发生了兴趣。高中一年级时，参加了共青团，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中苏一些革命小说，从中得知一些革命家也是把报纸作为革命宣传的武器，这就加深了我对新闻工作的兴趣，并在班上主办了墙报《石榴花》，在学校引起了强烈反响。及至高二年级因参预领导学生减费运动，被学校当局开除学籍。找什么职业作掩护呢？当时，我也幻想过作个小报记者。这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后来，1935年初秋，日本侵略魔掌伸向华北，忧愤之下，我便和进山中学同学薄恒温（现名史进前）冒着生命危险，拟路经上海转江西革命根据地。可是，哪里知道中央红军已经转移，我们便停留在上海，参加左联、社联活动。这时，工作无路，生活无着，别说找个校对工作做，就是找个书店营业员也是难上难呀！这期间尽管从内在条件说，有从事新闻工作的兴趣，但从外在条件说，共产党还处在地下，国民党统治者哪里还会给一个革命者有什么求职求生的机会呢！？

还是到了1937年5月，我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后，有了从事新闻工作的外在条件，才实现了我多年的梦想。那就是在同年11月从陕北公学第一大队毕业后，被抽调到中宣部文化训练班学习。而这个训练班正是为筹办汉口《新华日报》培养干部的。所以在中宣部朱光同志和我谈话时，我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实在是没有想到的事。1938年1月底在训练班毕业后，中宣部即分配我到西安作党的地下工作（兼做汉口《新华日报》特约通讯员）。6月，西安党的组织因要调整我的工作，根据中宣部的规定，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代表林伯渠便和中宣部联系后，当即调我到汉口《新华日报》做记者。我就这样正式开始进入报社的大门，完全实现了我从青少年就梦寐以求的宿愿。这要不是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开辟了新的抗战局面，在国统区，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了办报的条件，岂不是

和在旧中国一样，求职无门、求生无路吗？！做记者就更没门儿了。写到这里，我联想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名言。从我个人的经历中，也可以说明这是一条真理。如果我不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紧跟中国共产党，坚定地走向革命之路，也很难有这样的机会去从事我所喜爱的新闻工作。我在记者工作中，所以能够兢兢业业、刻苦钻研，不怕艰苦和牺牲，除我热爱这一行外，坚持和珍惜革命之路，做好革命宣传，也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动力。因而，我的第一个体会，就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这对一个新闻记者来说，可以说是他的第一生命。这无论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也无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是具有着普遍的意义。

走革命道路，热爱党的新闻事业，既然是一个记者的第一生命，那么在采写工作中，怎样正确地反映党的声音、人民的呼声，就成为检验记者成熟程度和贡献大小的标志。在战争时期，我先后在几家党报工作过，我采写的对象，尽管有各党各军各阶层的人士，所反映的也是各党各军各阶层人士的声音，但它却都是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党在抗战时期“努力团结一切力量，战胜万恶的日寇”，“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和任务。从而正确地体现了列宁办报的原则，党报既是党的喉舌，也是人民的喉舌。举例来说，我写的国民党西北军武士敏将军在晋东南协同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事迹的系列通讯，华北《新华日报》就作了连续的宣传报道。在武士敏将军殉国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还举行了悼念活动。还有我写的沁源军民坚持二年半围困斗争的系列通讯，延安《解放日报》更是作了连续的宣传报道，并写了《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把沁源赞誉为“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正是因为这些通讯、报告文学中，我遵循和体现了列宁办报

的原则，反映了抗战军民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响应和执行了党在抗战时期的方针路线和政策，所以，它在当时就给人们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而作为历史事件，这些第一手的资料，则至今仍有它的重要历史价值。如果在采访工作中，我不是沿着列宁指引的办报方向走去，那么，也很难说能取得这些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写作成果。

在政治上走什么道路，在业务上坚持什么方向的问题解决了，在工作中还得依靠自己的勤学苦练，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对问题善于独立思考，从实际出发，进行具体分析，能提出自己的新见地。我最初作记者时，不仅没有采访经验，也没有写各种新闻体裁的经验。一走上工作岗位，就得无条件地接受编辑部的任务，想尽办法去按时完成。当然写作的质量和水平，就比不上有写作经验的老记者了。在汉口写特写，我比不上彭子冈，在太行山写人物访问记，我比不上刘白羽、陈荒煤。但我没有因此而泄气，相反的，它更促进了我向干部群众学习、向生活学习的勇气和决心。

向生活学习，主要是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思想、工作、语言和斗争，搜集和掌握他们进行工作和斗争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并能从实际出发，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提出新的见解或具体的建议。这样，写出来的东西，不论是新闻通讯、特写、报告文学或诗歌，才能有它的生命力。例如，1939年初夏先后对白晋北线东西两侧武士敏师和陈赓旅阻击日军南犯的军事报道，其所以能引起人们的注目，主要是在报道战争经过之外，还注重报道了它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对战局的发展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提出了“我们还必须注意：当敌人在晋西、晋南，均受到严重挫折的当儿，她很有可能掉转头来，

‘肃清’其紧抓着她进攻西北之尾巴的晋东南一千二百万抗日民众，和几十万抗日军队，巩固其占领区的统治，保障其后

路。因此，晋东南的大战，犹如弓箭在弦，随时都可以一触即发！”果不出所料，20天之后，就在7月1日左右，敌寇调集日伪军两万之众，沿白晋线对晋东南发动了第二次九路围攻。这就对全区军民的备战工作，及时起到了敲警钟的作用。

再如1943年夏，我写的围困沁源敌人的几篇报告文学，就对沁源8万军民坚持对敌斗争的形势和发展趋势，作了切合实际的分析和评价。在敌人占领沁源半年之际（5月4日），我写的《沁源人民已百炼成钢》中，就作了这样的评价：“日本法西斯在沁源演出的这场‘山岳剿共实验区’的闹剧，极其滑稽又丢丑地落下了帷幕！你看，日军重兵侵占沁源，苦心经营，一无所获，反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特别是经日军在本地区发动的这场空前规模的战争，把沁源8万军民锻炼如钢铁一般的坚强，岂不是一件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新中国的儿女们，已在晋冀鲁豫边区太岳区的大地上茁壮成长起来。”在敌人占领沁源半年之后写的《没有人民的世界》中，对这一斗争作了更高的评价：“象这样一个没有人民的世界，可以说是亘古未有的事情。敌人侵入沁源已有半年，却仍然是空城一座。百里之内建立不起伪政权，在沁源两万人的包围中，日本侵略军只占领了一个找寻不见人民的世界。虽说日军侵占了沁源，但沁源并没有沦陷，这难道不是举世罕见的奇迹吗？”

在太岳区大地上茁壮成长起来的新中国的儿女们，勇敢而艰苦地创造了这个举世罕见的奇迹，在一年零三个月之后，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中共沁沅县委书记、围困沁沅指挥部政委等同志，受到中共中央军委叶剑英等同志的接见，并给予鼓励和表扬。还安排刘开基向延安各界作了报告。会后，主持会的同志，又对鲁艺的剧作家恳切地说：“开基同志给你们提供了丰富的花粉，希望你们能酿出很好的蜜。”不久即创作出由王震之、吴雪编剧，一波导演的七幕话剧《沁源围困》，演出后

曾轰动一时。还得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鼓励和表扬。中央党报——延安《解放日报》于1944年1月17日，发表了《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并作了这样高度的评价：“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

从上述事例中，完全说明这样一个真理：如果我不是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和抗战军民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就不可能取得第一手资料，更不可能对事件作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分析和评价。

向别人学习，范围也是很广的，不但要向有经验的记者和作家虚心学习，而且要向党政军领导干部及广大人民群众和广大官兵虚心学习。学习的内容，既包括思想作风，工作经验，也包括生动活泼的文风和通俗生动的语言。从而丰富自己的写作源泉，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在战时采访中，尽管条件十分困难，经常要背着行李下乡采访，但我采集群众的谚语的小本子，却一直随身携带。在40年代的写作中，就更注意通俗化的问题了。因而有的报告文学和诗歌，在干部和群众中还传诵一时，甚至有的老同志时至今日，见面时还喜笑着背诵：“鹿儿迴，青龙河边，一个小山庄，三块四疙瘩，隔河为界，分得清。……”（1941年9月写的诗《俺还要活下去》）。再如，在《没有人民的世界》、《沁源人民百炼成钢》和《山头英雄们》几篇报告文学里，大量运用了群众的语言，通俗易懂的语言，使作品更形象生动，更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这就增加了它的可读性、文艺性。

因之，深入生活，向生活学习，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也是在战时采写工作中，促使我取得这些写作成果的主要途径之一。

我在战时新闻事业中的成长，除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外，

各时期、各地区有关领导同志，对我工作上的指引、教导、鼓励和支持，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林伯渠等老一辈革命家，是我最初走向报社大门的引路人，入门后，直接指导我进行采访工作的，先后有华西园、吴克坚、何云等同志。在太行、太岳军事采访工作中，又先后得到陈赓、薄一波、安子文等党政军领导同志的严格教诲和帮助。1943年我写的沁源围困斗争的系列通讯，就是他们亲自带到延安《解放日报》的。而这一系列通讯，又是在陆定一同志任总编时，在《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的，并由他起草了《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1979年粉碎“四人帮”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围困沁源斗争通讯集《没有人民的世界》，叶帅题写了书名，书写了题词，刘帅送来他病前书写的题词，薄老撰写了序言：“永远铭记这壮烈的一页”。这次出版《战时烽烟》诗文集，陆老题写了书名，中国新闻界的著名老报人张友渔撰写了序二：《辛勤笔耕，实事求是》。正是在他们这些热情地关怀和帮助下，这本反映两个战争时期我写的军事诗文集，才得以出版。藉此出版的机会，我特向这些老领导，老前辈致以衷心的感谢！

总之，道路有几条，而且是迂回曲折的。走什么道路，怎样去走，主要还是靠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觉悟和刻苦努力。走小路走歪路是不会有光辉前程的。

1992年3月7日于北京